

## 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

## 听陈苏镇教授讲述秦汉历史

□ 安平

2018年11月7日（戊戌年九月三十日），寒风乍起。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冬，本是“蛰虫伏藏，万物冬眠”的日子，然而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五层的“文会堂”内，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细一打听，原来这里正在举办“稽古贯通 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

走进会场，更被这火爆的场面惊呆了。若不是确认自己身处国图，还真以为乱入了某个当红小生的见面会现场。这里汇集了低至中小学生、上至专业研究人员等形形色色的老中青三代观众，他们不再拘泥于原本的二百个座位，毫无怨言地或蹲坐在讲台前、或站立在间隙处、或拥挤在门口，只为一览北大历史教授的风采。

本场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陈苏镇教授，他分两讲做题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秦汉”的报告，分别从“秦汉帝国面临的难题”“秦朝的法治”“汉初的无为”“儒家的德教”“汉武帝尊儒”“西汉后期的改制运动”“王莽改制和篡汉”“东汉的抉择”八个方面，贯通思想史、制度史、政治史等多领域内容，对秦汉的历史与政治文化进行了细致阐述。让我对秦汉两朝历史、特别是政治大势的开展、演进有了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讲座伊始，陈教授首先对“秦朝的覆亡之因”给出了更为广义

的解释，他不仅仅着眼于主流历史叙述中的“天下苦秦久矣”（即亡于暴政），而是将眼光放到秦的关中文化与六国东方文化的巨大隔阂上。秦朝在统一过程中，试图用统一的法律在东方各地移风易俗，改造东方社会，实现文化的统一，但在推翻秦朝的战争中，各地的表现却是不同的。表现最激烈的是南方的楚人，其次是齐和赵，至于关中秦地，则完全没有发生反秦暴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东方六国旧地中，楚地的固有风俗习惯和秦法相距过远，文化差异激发了冲突，导致楚人对秦的统治最反感，反秦也就最激烈。

随后，陈教授详细介绍了汉帝国如何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虽汉初仍坚持“据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但汉朝承秦亡之鉴，对于国家力量与地方文化、风俗的冲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以“郡国并行”制，缓解东西文化冲突，避免因汉朝法令与东方风俗的差异而再生事端。随着文、景二帝逐步削弱东方诸侯的实力，汉法进一步普及东方，为避免蹈秦覆辙，儒术因而兴起，借助以仁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逐渐实现文化的整合与统一。

在汉儒政治学派的发展脉络方面，陈教授把握“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两条线索进行分析，主要介绍了提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的《谷梁》学，以及主张性善情恶，强调“以德

化民”的《公羊》学。自武帝以后，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具体而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受到重用，《公羊》学的思想获得统治地位，春秋决狱使得法律初步儒家化，王道渗透入霸道之中。西汉后期，宣帝继位，《谷梁》学大盛。受其影响，元帝时期进行了一场托古改制运动，但因外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未能有太大进展。成、哀时期，王莽以外戚集团领袖的身份尊崇托古改制，加之《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经学的兴起，推动改制运动走出困境，并于王莽时代达到巅峰。然而，随着东汉的建立，国家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变为否定态度，“以礼为治”的指导思想宣告失败。东汉汲取经验，定都洛阳，跳出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为《公羊》学重新拨乱反正、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

讲座中，陈教授也总结肯定了秦汉王朝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秦汉历史前后440年，其中秦朝16年，西汉215年，新朝15年，东汉196年。这是中华帝国建立和逐渐巩固的重要时期。中国很大，文化多元。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建立统一的国家，进行统一的管理，是个很大的难题。

秦汉王朝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反复探索，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径，从此确定了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以史为鉴、以古为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本次“稽古贯通 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场场座无虚席，汇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听众，堪称少长咸集。这恰恰证明了“史学热”的升温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也预示着普通公众对于文化服务的诉求之大、之深。不可否认，举办历史讲座颇有不易，对选人、选题方面要求极高。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通力合作，甄选师资，充分顾及听众，力求使高雅艰深的学术转化为人人可懂、可读的讲词，提高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知识修养，功莫大焉。作为一名普通观众，非常有幸能在此得到学习机会，期待听到更多专家学者的精彩分享。



## 不忘本来 面向未来

## 加强佛教古籍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要举措

□ 曙 祥

（上接2019年第3期10版）

和佛教类的文物一样，虽然佛教类的古籍和佛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在保护和研究方面，投入最大的并不是佛教界，而是国家的文博和图书典藏部门。对于佛教界来说，教职人员的生存大多是依靠自养，很难有更多的力量在文博和古籍方面加大投入；国家对佛教界的管理和引导，重点还是落在宗教信仰方面，难免会忽略从文物古籍的保护与研究方面来提供经费、引导和人才。

其实佛教的教职人员们对佛教的文物和古籍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并且终身都在学习。如果采取一定措施，对这些教职人员加以培养、引导，就可以培养一支保护佛教文物古籍的重要力量。

以古籍保护工作为例，长久以来，拥有大量佛教古籍的佛教界多少年来并没有出台过大的保护举措，宗教事务部门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引导，直到2007年，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观。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根据文件精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和人才培养等工作，国家宗

教事务局也派员加入了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这一系列国家级别行政行为的带动下，佛教界也采取了不少古籍保护的举措。

2016年和2017年，在文化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指导下，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业务支持下，中国佛教协会连续主办了“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保护管理研修班”和“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帮助各省佛教界培养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良好影响。

2016年9月2日—9月6日，为期五天的“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保护管理研修班”在北京灵光寺举办，来自中国佛教协会、地方佛教协会、佛教院校及各大寺庙等47家单位的66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通过多位古籍保护领域专家学者的专业授课，学员们系统地掌握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养工作”“古籍装帧形式”“书画修复与装裱”“古籍修复技术”“古籍虫害防治”“古籍保护环境与设施”等古籍保护的基础理论。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有很多是各大寺院的负责人，这样的培训对于提高各大寺院对古籍保护的认识水平、加强后续佛教古籍的保护与人才培养工作，

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2017年8月29日—9月29日，“第一期全国佛教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成都文殊院举办，来自全国佛教三大语系20余所古籍收藏单位的33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班。培训班为期33天。培训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重庆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处专家们的悉心指导下，学员们系统学会了工具使用、工具制作、纸张裁切、浆糊冲制、书页修复、线装书制作、册页制作、函套制作、板墙制作等众多书画装裱和古籍修复的专业技能。完整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不仅扎实了掌握古籍修复的技艺，还学会了很多理论知识。这些参加过培训的学员，在应急处理受损古籍的能力、准确联系到古籍保护专家及机构的能力、评估古籍保存环境和设施的能力、查找古籍保护资料的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如果把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对于全国佛教界各古籍收藏机构的古籍保护工作，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但可惜的是，不少学员参加完培训回去以后，拥有的古籍保护特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希望以后能出现一个机制，把这些分散

于各处的人员联系起来，提供施展能力的机会，让他们在各省佛教古籍的保护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

除了中国佛教协会在大力推行古籍保护工作，地方佛教界也在积极行动。从2007年开始，各省佛教界积极参与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写并提供了大量古籍普查数据，申报众多佛教古籍进入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派人参加古籍普查登记业务技能培训和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多个寺院申报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开始建设标准化古籍书库。

这些措施引得众多教职人员重视起收藏于佛教界的古籍，也让很多收藏于佛教界的古籍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佛教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保护佛教的古籍，是在为后代子孙保护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最古老的史料。如今，已有一定政策和举措对佛教古籍加以保护，但仍需加大力度。加强对佛教古籍的保护工作，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要举措！

（本文完。作者单位：中国佛教协会。）

佛教古籍文化，是中华文明诸多支流中一条重要的支流。两千年内，来华的外国佛教徒及中国佛教徒翻译和撰述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古代中国人乃至周边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延续至今，为加强对佛教典籍的保护，上期“古籍保护专刊”上，中国佛教协会曙祥法师从“不忘本来 面向未来”的理念出发，讲述了佛教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及迫切性，本期，曙祥法师在介绍了近年来佛教界古籍保护工作重要举措的基础上，表达了要对佛教教职人员加以培养、引导，以期能形成一支保护佛教文物古籍的重要力量的观点。

2018年11月23日和11月30日的下午，在国家图书馆文会堂，笔者有幸现场聆听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题为《政治分裂与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的专题讲座。这场讲座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系列讲座“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的第六部分。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系列讲座，也是纪念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11位北大知名学者主讲，可谓诚意满满。能够在一系列讲座中，亲聆如此多位专家学者的玉振金声，实在是幸莫大焉。尤为令人动容的是，讲座会场爆满，座无虚席，甚至很多读者席地而坐。这些读者当中，上有耄耋之年的黄发老人，下有稚气未脱的少年学子，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济济一堂。凡此种种，有力地说明了讲座的吸引力，北大学者的号召力以及中国古代史的魅力。

叶炜教授即是这11位学者中的一员，他的专长在魏晋南北朝史和政治制度史，他正是以此为基础，将我们带回到那个乱如菜丝的历史阶段当中去的。这个时代，既有金戈铁马的战士，也有采莲南塘的莲娃；既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胜利者，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失意者；既有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英雄，也有白眼碌碌、南窗寄傲的名士。北方“五胡乱华”，南方“五马渡江”。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唱了一出热闹非凡的历史大戏。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的时代，千头万绪，梳理不易。

叶教授的讲座分为两大部分，上半部分由东汉末年的形势讲起，追根溯源，讲述了东汉王朝的瓦解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并着重讲述汉代刺史一官，由负责监察的中央派出官员，演变为掌管一地军政大权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过程，以说明地方权重现象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由来。接着，又分析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和迅速崩溃。从统治集团严重奢侈腐化、宗王权重，及民族内迁引发的民族矛盾三个方面，给出西晋为何迅速崩溃的答案，着重讲述了宗王出镇和少数民族内迁，及由他们带来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等问题。本部分的重点在东晋南朝，而主线在于皇权的低落与回归。这个时代的演变趋势在于由南强北弱变为北强南弱，由东晋门阀政治发展到南朝皇权政治，掌权者（即皇帝）由高级士族到低级士族再到寒人，朝廷由士族当权到寒人掌权。

在东晋时期，着重讲述了由北大历史系田余庆先生提出的“门阀政治”这一概

念。叶教授以“王与马，共天下”为例，分析了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特点。并将田先生的学术观点与日本内藤湖南等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以突出田先生的学术地位。门阀政治实际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而门阀士族的影响却极为深远，这就形成了“门阀制度”。叶教授结合唐长孺、祝总斌等先生的观点，详细介绍了门阀制度在曹魏、西晋初步兴起，到东晋、南北朝达到鼎盛，再到南北朝后期衰落下去的整个过程。门阀制度的兴起阶段，由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到了鼎盛阶段，则由门品决定官品，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也变得极为森严。及至衰落时期，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在官员中比重增加。结果士庶界限难以坚持，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

到了隋代，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彻底衰落下去。而衰落的原因，则在于门阀士族的衰靡之气，远离实际的政治事务，远离政治权力的核心。继东晋皇权衰落之后，刘宋迎来了皇权的回归。南朝皇权回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军事因素不可忽视。皇权的回归也是有限度的，与北方政权无法比拟。刘裕建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皇权，也成为南朝基的本政治格局。首先，建立中央台军，加强禁军力量。其次，内用寒人，在中央任用寒人、恩幸掌机要；再次，外托宗室，任用皇子担任荆州刺史，宗室担任扬州刺史。叶教授通过寒人、低级士族担任中书舍人一职和任用宗室等现象，说明南朝皇权的回归。

讲座的下半场，以民族矛盾为主线梳理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发展脉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胡化汉化与北朝主流论和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这一时期东西势力的争夺，值得注意，正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指出的，这一时期的争夺，实际上是位于华北两大战略要地的两大势力——以长安为中心、据于关中地区的势力和以襄国、邺、中山等地为中心、据于关东的势力——之间的角逐。虽然北朝的局面比较混乱，其政治面貌却与东晋南朝有着明显的差别。相比于东晋皇权低迷，北方汉赵之异族军事专制却明显强化。这种皇权的强化，不止是历史的遗留，更多地源于政权本身集中化的权力。这一时期前秦、北魏、北周的三次统一同样值得注意，而三次统一不久，就发动了对南方的三次大战，即淝水之战、瓜步之战和平陈之战。最终，由源于北周的隋，完成了南北统一的历史任务。这说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之所以由北方政权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方皇权的强大。

这一时期，存在着胡化与汉化的问题。在中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更为原始的状态，即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在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特点明显。比较全面的汉化，始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在位（471-499）期间，可以49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主要是冯太后秉政，后为孝文帝亲政。两个阶段的主要趋势都是汉化改革。孝文帝于490年开始亲政，491年，确定北魏在五行中之位次，将东晋南朝宋齐、十六国定为僭伪，北魏承西晋之金德为水德，表明中华正统地位。太和十八年（494）由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并改革官制。继而通过定族姓、改汉姓，禁止鲜卑服饰、



□王春伟

# 君子如玉 其言亶亶

## 叶炜教授《政治分裂与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讲座回顾

鲜卑语言，规定鲜卑贵族死后不能归葬平城等措施，全面推行汉化。这种激进的汉化措施，一方面使北魏政权在北方扎下根来，有利于北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北魏政权内部的分裂，即迁洛集团与六镇集团的矛盾。六镇集团的鲜卑人和胡化的汉人，仍然保留了胡化旧俗，与汉化的迁洛集团发生矛盾，最终酿成了六镇之乱，直接导致了北魏的瓦解。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源于六镇。出现了胡化现象，东魏、北齐重新使用鲜卑语，还出现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情况。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而西魏宇文泰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恢复了胡族诸将的胡姓，还向汉人广赐胡姓。叶教授通过北周王光、叱罗招男夫妇墓志等实例，说明汉化是北魏孝文帝改汉姓的目的，但胡化并不是西魏复、赐胡姓的目的。从宇文泰改革措施的整体来看，不仅仅是单纯的胡化、汉化，或者说已经跳出了胡化、汉化，显示出其整合胡族与汉族，并别觅一途、标新立异、创立新制度的取向。在胡化与汉化的过程中，北朝的政治风气与南朝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对于南方的衰靡之气，北朝社会呈现出一股雄健之风，政治上也呈现出一股昂扬进取之风。承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之论，田余庆、阎步克等先生提出了北朝主流论。北朝主流论除了强调皇权之外，还强调官僚制度，两者都是北朝强于南朝。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最后，叶教授总结了魏晋南北朝隋唐400年分裂留下的遗产，即南方国土的开发，文化的整合及族群的凝聚。

整场讲座围绕着统一与分裂的大势，南朝以皇权的衰落与回归为主线，北朝以民族矛盾为主线，分别展开。最后归结为，中国历史具有大一统的传统。叶教授特别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统一的时间与分裂的时间相差无几，我们应当正视分裂时代，正视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叶教授通过两个下午的讲座，有条不紊地将魏晋南北朝400余年纷繁复杂的历史呈现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叶教授乃是谦谦君子，温其如玉，整场讲座娓娓道来，让人如沐春风。在总共长达六个小时的讲座中，叶教授全程站着讲授，大家风范可见一斑。

